

FENGXI JUNE AQUANSHU

奉系军阀全书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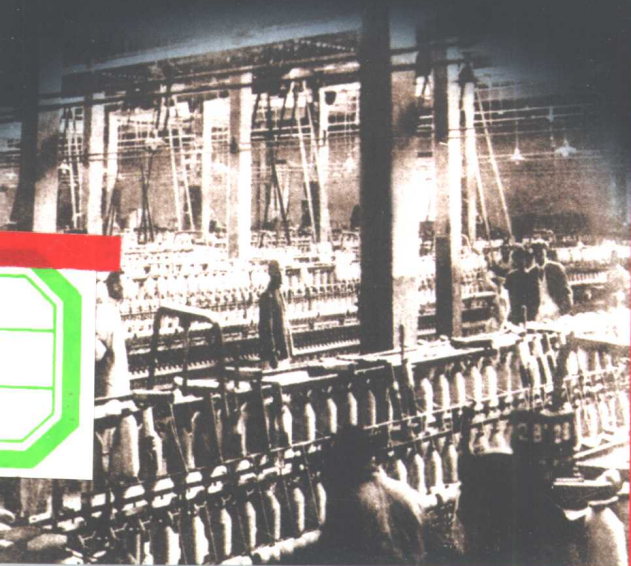
胡玉海 主编

奉系经济

● 马尚斌 著

辽海出版社

FENGXI
JINGJI



奉系军阀全书⑤ 胡玉海 主编

奉系经济

马尚斌 著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奉系经济/马尚斌著. —沈阳:辽海出版社,
2000.6

(奉系军阀全书/胡玉海主编)

ISBN 7-80649-257-7

I. 奉... II. 马... III. 地区经济-经济史-中国-东
北地区-民国 IV. F12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3744 号

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科研项目

编委会名单

主任：胡玉海

编委：马尚斌 车维汉 张 伟

胡玉海 郝秉让 郭建平

总 序

由6本书组成的《奉系军阀全书》，是一套专门研究奉系军阀的学术专著。

何谓军阀？“军阀”的“阀”字，在中国古代是阀阅之家的“阀”，即指官宦人家门前旌表其功绩的柱子，标明家族具有军功，含有门庭显赫的褒义。但到了近代，凡被冠之以“军阀”的个人或集团，不仅不是褒义却完全是贬义。1918年，陈独秀为军阀下定义，认为军阀是“毫无知识，毫无功能，专门干预政治，破坏国法，马贼式的、恶丐式的”人物^①。1920年，政治家谭平山对军阀的界定是：“握了一种特殊的势力，成了一种特别的阶级，组织了一种特别的系统，这就是叫做‘军阀’”^②。北伐期间，蒋介石也曾给军阀下过定义，他说：“军阀把持的是地盘，……要的是财产，……爱惜的是自己的生命，……取给的是帝国主义。”^③ 上述对“军阀”的界定和分析都是近理的，虽然角度不同，但都持贬义态度，可笑的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308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② 鸣谦：《军阀亡国论》1920年1月12日，原载《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6号，见《谭平山文集》1986年版。

③ 《革命文献》下册17，第46页，台北，1954年版。

是，蒋介石在北伐时虽对“军阀”下过贬义的界定，但很快他自己又重蹈“军阀”的覆辙，成了新军阀。

北洋军阀统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曾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彭明为军阀提出3条定义，即“他们各有一支为自己争权夺利而服务的军队”；“他们各有一块可以任意搜刮和统治的地盘”；“（他们）大都是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统治的工具”^①。这3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代表了过去多数人的观点。

台湾学者张玉法对军阀作了如下概括：养军的目的是追求个人和本军的利益；武力被当做解决纷争的正常途径；军事权不受行政权的拘束；国内如此，甚至国际种种秩序、法律也不顾及^②。这是完全从行为准则上来界定的。以行为准则来界定军阀的还有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政治系教授齐锡生，他在《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一书中说：“一个受人尊敬的军事领导人不会被称为‘军阀’，这个名词常用来称呼坏的军事领导人。”^③这种以行为准则为标准而确定的贬义是含混的。

美国学者薛立敦在《中国军阀——冯玉祥的一生事业》一书中，指出军阀的共同特点是：握有政治上的统治权势，控制一定的地域范围；武力是进行统治、巩固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掌握的武力是私家的军队；既无忠于“君主”、“恩主”的思想，也不为国家效力；谋取私家之利，维护一帮地位，是其最大职责^④。近代军阀特点与界定近代军阀是两个相互联系又不相同的概念，从军阀特点角度看，上述5点是近理的。

① 《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5—6期。

② 张玉法：《民初军事史研究（1916—1928）》，转引自来新夏《论近代军阀的定义》，《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期。

③ 齐锡生著，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第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④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第2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在界定中国近代军阀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应首推来新夏教授的《论近代军阀的定义》一文^①，他认为界定近代军阀应作如下表述：“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近代军阀是以一定军事力量为支柱，以一定地域为依托，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以封建关系为纽带，以帝国主义为奥援，参与各项政治、军事及社会活动，罔顾公义，而以只图私利为行使权力之目的之个人和集团。”这一界定是比较准确的，但不够完整。

因为这一论说也包括其它一些论说，还都是只限于就军阀集团和军阀个人来界定近代军阀，缺少历史定位。军阀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变过程中的一种政治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演变及消亡，并不是由军阀集团及军阀个人决定的。因此对军阀界定应作如下表述：近代军阀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政治现象，它是一个以一定军事力量为支柱，以一定地域为依托，以帝国主义为奥援，以封建关系为纽带，以民主政治形式行专制政治之实，以追求私利为主要目的的个人和集团。

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主要派系之一。发迹于清末民初的乱世之秋，崛起于民国的动荡时期，统治东北长达十余年；多次称兵关内，问鼎中原，几度操纵北京政权，其首领张作霖最后竟自封为陆海军大元帅，公然登上北洋政府末代国家元首高位。奉系军阀史在北洋军阀史和民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既是东北区域史研究的重点，也是北洋军阀史研究中的主要内容。

对奉系军阀史的研究，国内是从80年代初才开始，到目前为止，也只有几种版本的张作霖传记面世，还有几部如吴俊升、张作相传记，多数都是回忆录和纪念性的文章。对奉系统

^① 《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期。

治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对外关系等方面的系统研究，仍是一片空白。

奉系军阀作为一个政治、军事集团，它缺乏统一的政治理念，没有思想上的一致性和始终追求的政治目标。但它却在东北统治 10 余年，并曾多次影响全国的政治局面。因此，深入探讨一个缺乏政治信仰的封建军事集团如何维持 10 余年统治，以及其内部组织结构、凝聚力的生成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以及部下多数主要人物，多出身于草莽，又与北京政权没有历史渊源。但它却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迅速发展，军事力量大增，并跻身于三大军事集团之中，成为影响和左右全国政局的一支主要军事力量。对它的军事力量的分析、研究，有利于我们对整个中国近代社会的深入研究。

奉系之所以能成为北洋军阀中一支主要派系，并能在最后与北伐军进行对抗，靠的是军事实力，军事力量是以经济实力支撑的。奉系的经济实力，除有东北丰富资源这得天独厚的条件外，它的掠夺手段、经济政策，包括发展基础工业、民族工业的政策，都值得深入研究，这对今天的建设仍有借鉴作用。

奉系统治东北时期，中国正处于外遭帝国主义侵略，内部又四分五裂的状态。东北地处日本和俄国两大强邻的挟制之下，内外矛盾错综复杂，既要与之交往，又要抵制其侵略。考察张作霖的对外交往，既有妥协勾结的一面，更多的是据理力争，奋力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的一面。客观、全面、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奉系的对外关系，不仅可以加深对近代史的研究，还会为今天的对外开放带来有益的借鉴作用。

奉系军阀形成于民国初年，解体于 1928 年的东北易帜。但全书内容的上下限并不这样严格，为上寻原因追到清朝末年，下寻结果延到“九一八”事变。

总之，《奉系军阀全书》对于我们了解奉系全貌，帝国主

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以及奉系与日本和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关系，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整个社会，特别对于我们开拓未来，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意义。

该丛书由《奉系纵横》《奉系人物》《奉系军事》《奉系对外关系》《奉系经济》《奉系教育》6本组成。撰写出版它的初衷，是为了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缺。因此，这套尝试之作，只是为这一领域的研究起个头，深入研究还待于来者。

在撰写这套丛书过程中，我们力图以社会存在来解读社会意识，将人和事都放到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溢美，不隐恶，褒其所当褒，贬其所当贬，实事求是，再现历史原貌，找出规律，启迪后人，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和遵循的原则。

奉系军阀史研究，在80年代初期始曾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一些论文和人物传记陆续发表、出版，发表论文最多的是陈崇桥老师。90年代初陈老师曾提出一个研究计划，后因各方面条件不具备，计划未能启动。1998年初，奉系军阀研究被定为国家“211工程”标志性成果项目，研究工作才全面启动。完成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陈老师的学生，作为学生完成老师的遗愿，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对老师的一种纪念。

这套丛书今天能够面世，得到了辽海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我们与辽海出版社社长李家巍、副总编辑兼本书编辑王申同志探讨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他们强调突出地方特色、追求社会效益，特别是他们编辑工作的严谨风格令人敬佩。

我们强调说明的是，这是一套拓荒之作，拓荒之作有拓荒的优点，当然也有它的缺点。

胡玉海

2000年元月

前 言

《奉系经济》作为《奉系军阀全书》的一部分，着重阐述的是奉系军阀统治时期东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开发；作为区域经济史研究的一部分，则着重阐述的是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相关的诸因素。

长期以来，由于诸多原因，对于奉系军阀统治时期东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直缺乏较系统、较全面、较客观的论述和研究，使该地区的近代化进程若明若暗。因此，加强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社会经济研究，对于充实奉系军阀史、东北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内容，增强它的学术性、科学性、全面性，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实际上，这个时期是旧中国东北地区社会经济许多领域发展的重要时期，是推动东北地区近代化乃至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农业尤其是土地的开发，是旧中国该地区规模最大、成绩最显著的时期；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汽车制造业等，在技术上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交通尤其是自建自营铁路方面，不仅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在国内占有突出的地位。张学良主政东北后，更是较全面地推动了东北地区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就全国来说，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于帝国主义的侵

略，由于长期不间断的军阀混战，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许多领域、许多部门、许多地区均受到阻滞和破坏，但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由于具有诸多有利因素，却明显地向前发展了。因此，从分析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关的诸因素研究的角度，本书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丰富有关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学术价值。

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对于发展地区经济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不平衡是人类社会经济最基本的特征。不同的地区，所具备的自然条件、社会政治环境、劳动者素质和历史传承性是不同的，因此在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特征方面，均表现出较明显的差异。故为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加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

本书在概述奉系军阀统治时期东北区域经济开发的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历史总结。该时期经济开发的不利因素，主要包括外国的经济侵略、生产力低下及庞大的军费支出等等；该时期经济开发的有利条件，主要包括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国内外市场的扩大、相对稳定的地方政权及军阀官僚的投资等等；该时期促进开发的若干举措，主要包括谋求社会的稳定、重用人才广求建议及吸引移民流入等等；该时期经济开发的历史局限性，主要包括政策重心的严重偏离、勾结日本的经济恶果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等等。

本书还分析了与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关的诸因素，重点分析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东北地区经济开发的关系；社会政治环境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生产者数量与素质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左右；城市化进程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交通尤其是铁路建设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查阅了大量有关资料、论文和专著，充分吸收了孔经纬、王贵忠、魏福祥等许多东北地方史和经济

史专家的研究成果；东北三省档案馆、辽海出版社、《奉系军阀全书》的主编，以及诸多的专家和学者，均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和多方面指导。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受时间、资料、研究基础等多方面局限，奉系经济研究尚属开始，许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作者愿与诸位史学界同仁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强该领域的研究。竭诚欢迎诸位专家、学者批评帮助。

目 录

总序	1
前言	1
一、奉系统治时期东北区域经济的开发	1
1. 土地开发的逐步深入	1
2. 农业近代化趋势的加强	14
3. 轻纺工业规模的扩大	25
4. 工矿业的近代化建设	80
5. 军事工业的飞速发展	103
6. 自建自营铁路的显著成就	113
7. 一般交通电信业的建设	151
8. 商业贸易的日益活跃	170
9. 金融业的发展与财政状况的起落	197
二、奉系统治时期东北区域经济开发的历史总结	240
1. 开发的不利因素	240
2. 开发的有利条件	260
3. 促进开发的政策措施	278

4. 开发的历史局限性	290
三、与地区经济发展相关的诸因素分析	296
1. 自然条件的制约	296
2. 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	304
3. 生产者状况的左右	306
4. 城市化进程的促进	308
5. 交通建设的推动	314

一、奉系统治时期 东北区域经济的开发

1. 土地开发的逐步深入

土地开发是农业开发的基础，也是农业发展的前提。东北地区土地开发较晚，较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则是在奉系军阀统治时期。

(1) 清代东北土地的初步开发

由于东北是清朝的发源地，故清朝统治者主要是注重这里政治秩序的稳定，旨在能够以此达到长期保存满族入关前所具有的淳朴尚武习俗，维护当地旗人生计，并独自享占东北自然资源的目的。为此，在清朝近 300 年的统治时间里，除清初的短暂时期内实行过招民垦荒的政策而外，基本上都以行政命令手段，强行将东北封禁起来，不准汉民进入。乾隆初年以后，封禁愈加严厉，甚至大批地驱逐和遣返留寓汉民。这种状况一

直持续到清末。长期人为的封禁政策，造成了当地经济与中原地区的相对隔绝状态，导致东北农业种植技术的落后，人口稀少，大片可耕地未能开垦。

清政府的禁令，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内地人口向关外的流动，但是却不能完全禁阻汉族人民进入东北地区。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多的关内贫民以私越长城、偷渡海口等方式，涌向仍在沉睡的东北沃野。根据《清实录》的有关记载，乾隆三十四年（1769），仅吉林阿勒楚喀、拉林地方，当地政府就查出新来流民 240 多户。乾隆五十八年（1793），直隶、山东受灾，贫民出关至盛京、吉林、蒙古者不下数十万。嘉庆十一年（1806），长春厅查出新来流民 7 000 余人。嘉庆十五年（1810），吉林厅新增流民 1 459 户，长春厅新增流民 6 953 户。至咸丰、同治年间，内地汉民出关者更多，几乎有不可阻挡之势。

一批又一批汉民的出关，无疑对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受益最大的应属农业。

一是促进了荒地的开垦。汉民的涌入，使东北的耕地面积急剧扩大。据官方记载，康熙二十四年（1685），盛京地区汉民拥有的土地（时称民地）仅有 311 750 亩，雍正十二年（1734）时，即增为 823 047 亩，50 年间增加了 51 万余亩，平均每年增加 1 万余亩。这其中还不包括大量被隐漏未呈报的土地^①。土地开垦的速度，随着流民数量的增多而愈益加快。乾隆八年（1743），仅吉林之永吉州、伯都讷二处即首出民人余地达 85 400 余亩^②。而据推测，从清初到乾隆中叶的这一段时

^① 参见刁书仁：《略论清代东北旗界设置与管理》，《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1 年第 5 期。

^② 《清高宗实录》卷 184，乾隆八年二月己亥。

间里，盛京地区各州县平均每年新增耕地面积约在1 000亩至2 000亩之间^①。

二是防止了熟地再荒。涌入的汉民，除了垦荒，在耕种熟地，防止再荒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清统治者为保证八旗生计，在东北实行了严格划分旗地、民地的政策，将大片优质土地划归旗人耕种，不许民人侵越。但由于清政府长期实行八旗恩养政策，使得许多旗人早已不适耕作，导致划归的耕地不断抛荒，其土地荒芜面积非常大，如嘉庆五年（1800），宁古塔旗人承种的27 000余亩官地，抛荒者竟至19 000余亩，占承种地亩总面积的70%以上。这些抛荒土地后来都不得不改由民人耕种^②。当时最普遍的情况是，不谙耕作的旗人相继将政府拨给的土地典给或出租给民人耕种，结果使旗人所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少。清政府虽然屡颁禁令，甚至多次采取清丈、赎典等措施，但是仍无法禁止，遂形成清代东北地区的旗地不断向民地转化的趋势，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关内汉民的不断涌入。

三是带来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关内汉民冲破封禁进入东北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向关外，特别是吉林和黑龙江地区传播的过程。流民的到来，不论在生产工具，还是在耕作技术方面，都使得当地原有的落后原始状态得到大大改观。除此之外，关内汉民还带来了优良的品种。其中，玉米在东北的种植及推广，就与汉族居民的人迁有着直接和密切的关系。翻开清代东北方志及有关材料，我们可以看到，清中叶以前，这里关于种植玉米的记载就很少，涉及

^① 参见陈桦：《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第4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吉林通志》卷30、